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6.01.002

杨度的四副面孔

——论唐浩明笔下的杨度形象

闫杰,宋德发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在长篇历史小说《杨度》中,唐浩明塑造的主人公杨度共呈现出四副面孔:书生杨度,政客杨度,禅师杨度,以及三幅面孔的纠结所造就的悲剧杨度;杨度形象的饱满和立体体现了唐浩明作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高度。

[关键词]《杨度》;书生;政客;禅师;悲剧人物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1-0009-05

The Four Faces of Yang Du

—— On the Yang Du's Figure in Tang Haoming's Writing

YAN Jie;SONG Def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novel *Yang Du*, there are altogether four faces of the leading character Yang Du portrayed by Tang Haoming: the scholar Yang Du, the politician Yang Du, the Zen master Yang Du, and the tragedy Yang Du as a result of the distress caused by the former three faces. The plenteousness and multi-dimension of Yang Du exposes the depth of thinking as a scholar and the artistic altitude as a writer for Tang Haoming.

Key words: *Yang Du*; scholar; politician; zen master; tragic character

1995 年,继蜚声中外的《曾国藩》之后,著名作家唐浩明推出了他历史小说的又一力作《杨度》。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出色的小说技法成功地处理了“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1]42}问题,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生动丰满的杨度形象。在唐浩明的笔下,书生杨度,政客杨度,禅师杨度,三种身份的艰难抉择以及无法调和最终造就了一个悲剧杨度,同时也完整勾勒出了杨度人生的四副面孔。

一 书生杨度

据说满清名臣曾国藩曾将他的幕僚门客分为

四种:一种是有本事有脾气,一种是有本事没脾气,一种是有脾气没本事,一种是没本事没脾气。若将此法推而广之,那么中国传统书生大概也可分为四种:有才学有抱负,有才学没抱负,有抱负没才学,没才学没抱负。无疑,“有本事没脾气”的是最为“上等”之幕僚,“有才学有抱负”的是最为“上等”之书生,而旷代逸才杨度堪称是这种“上等”书生的典范。

就才学而言,论诗词,杨度写得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抱负本无垠”这样气魄不凡的诗句,作得出“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年之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

收稿日期:2015-12-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51039);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A149)

作者简介:闫杰(1989-),女,河北沧州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宋德发(1979-),男,安徽庐江人,湘潭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公,明公负君究?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帝道真如,而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样意味深长的对联。论文章,杨度曾凭文才斩获“榜眼”桂冠,《粤汉铁路议》《金铁主义》亦可谓论辩精当、文采斐然,而其《君宪救国论》一文更是喜得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主动奉上“旷代逸才”的金字大匾。再论口才,杨度曾同日本著名教育家加纳治五郎当众辩论,也曾成功游说梁启超、张之洞、孙中山、严复等人。除此之外,杨度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为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题名;见解也常常是独到犀利,张口便敢“非韩薄柳”;甚至治印,他都能露上一手。如果说光有“中学”没什么了不起,那么杨度还有他的“西学”功底。他曾两度留学日本,精心研究各国教育、法律、宪政等等,绝对称得上一个专家级的人物。如果说光有“文的”也还没什么了不起,那么杨度还有他“武的”一面。其幼时曾随伯父“练拳习剑,骑马射箭”,后来更是手持一把日本腰刀救下了扶桑佳人千惠子。总而言之,杨度凭着他学贯中西、文武双全的才华,引得一代大学问家王闿运上门收徒,得张之洞袁世凯的举荐入京为官,还赢得了中日两位佳人静竹和千惠子矢志不渝的爱慕。

但是,孔老夫子曾有言曰:“君子不器。”所谓“器”,乃“形而下者”,非“形而上者”,即“道”,即《大学》所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所以,如果杨度仅仅是有才学而无抱负的话,那么他也就只不过是“个器”,是绝对担不起这“上等”书生的名号的。

而若论杨度抱负如何,可以说,在别人家的孩子还在忙着长个头儿的时候,杨度的志向就已经长得比自己的个头儿还要高了。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6岁的时候,杨度为自己和弟弟取了新名字,自己叫杨度,字皙子;弟弟叫杨钧,字重子。“母亲问他为何要这样改,他回答说改名乃为立志,兄弟俩立志做称量天下的人。”^{[2]8}小小年纪,其抱负可见一斑。后来,杨度做了一代名士王闿运的得意门生,在老师的三门功课之中,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只求功名利禄的“功名之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的“诗文之学”,毅然选择了有望“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的“帝王之学”,并立下誓言:“倘若蒙先生所教,能成就一番大业,虽不得善终,亦心甘情愿。”^{[2]61-62}再后来,随着世事时局的变化,杨度又前往日本研习西学,将君宪主张融入帝王之学之中。而拥有了西学这一砝码,杨度实践帝王之学,

建立个人功业的信心和信念都更加坚定了。

“上等”书生自然应当才学抱负齐备,然而这里还有个孰轻孰重的问题。历史上,一代枭雄曹操的两个儿子争夺帝位,最后文才不佳的曹丕赢了,才高八斗的曹植惨败。于是曹植在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中郁郁而终,执掌大权的曹丕却在一旁高呼:“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模样。大约“越难得才越让人觉得珍贵”吧,因才学不佳而备受弟弟压制不得父亲宠爱的曹丕对曹植的天生禀赋简直是羡慕嫉妒恨,而才气逼人的曹植则一直将政治抱负置于自身才学之上。不过,曹丕的这份胸怀大概也与其政治上的胜利有关,倘若当初败的是他,恐怕也难得有这份称颂文学的“宽阔胸怀”与“闲情雅致”。如此,孰轻孰重,端倪可见。

正所谓“书生抱负本无垠”,才学不凡抱负宏大又深受帝王之学熏陶的杨度,自然不会甘心于守着满腹才学度过一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听到千惠子“一个儒雅的日本学者”的评价时顿感不悦,也使他放弃了异域佳人、大笔财富和锦绣前程,毅然登上了回国的客轮。就这样,书生杨度迎来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身份——政客。

二 政客杨度

书生杨度做得可谓是风生水起,但政客杨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个中原因,作者唐浩明对杨度曾做过一个评价:“他是一个事功心极强、又诗人气质浓烈的政治活动家,故多变。玩政治,玩的是实力。他没有实力,他也没有找到人。”^[3]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杨度政治失意的两大主要原因:一是事功心太强,二是没有实力。事功心强本不可怕,只要有实力,封侯拜相都不在话下;没有实力本来也还不太可怕,只要事功心没那么强,关键时刻还能悬崖勒马;而最可怕的就是事功心强遇上了没有实力。

说杨度事功心强,很好理解。就是因为事功心太重,他参与维新变法不成又想通过经济特科入仕途,科举之路不通又想经由西学宪政成大业,扶持清廷不成又转而投靠袁世凯,发觉袁世凯靠不住又取“下下策”依附了他的儿子袁克定,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直至被冠以“帝制余孽”的千古骂名,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说杨度没有实力,似乎就没那么好理解了。论文章论口才论学识,杨度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人物,更曾完美处理粤汉铁路自办一案,也为袁世凯出了不少好计策,怎么能说是没有实力呢?其实,原因

只在于这里的“实力”不是指才学实力,而是指政治实力,其核心用两个字来概括叫“权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叫“帝王之术”。“历时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无数才智之士的共同努力下造就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以最高层政治为研究对象,它的容量很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里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等等。这门学问通常被称为帝王之学,也叫做帝王术。”^{[2][1]}也就是说杨度不是输在才学上,而是输在了帝王之术上。

这就好比骑马却被马摔,主持变法的商鞅死在了自己的法令上,精通权术的韩非死在了他人的权术上,爱情理论家简·奥斯汀终生未婚,军事天才拿破仑自滑铁卢战役后一蹶不振。行动上的巨人尚且在熟悉的地方栽了跟头,更不要说那些还在理论阶段梦想陶醉的人。其实,无论是杨度自己还是他的老师王闿运,虽一生醉心帝王之学,却始终是书生意气太重,他们只看到了帝王之学光彩照人的一面,所谓“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吴孙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2][6]}所谓“布衣卿相,书生公侯”,却对其阴险狡诈的一面估计不足。

过于浓重的书生意气加上没学到家的帝王之术,使得杨度在政坛上频频中招,这一点在杨度和袁世凯的关系上得到了最为鲜明集中的体现。混迹官场几十年,袁世凯可以说是玩弄政治权术的绝顶高手,凭着用到烂得不能再烂的四招:施礼遇,赠美女,送钱财,许权势,他就轻易俘获了初涉政坛的杨度的心。四招过后,满腔书生真性情的杨度也早已是感动得不能自己,“秉承视为知己者死的古训,杨度也甘愿为这样的人所驱使”^{[2][247]}。其实,袁世凯所用的不过是“驭臣之术”中的冰山一角“笼络赏赐之术”^[4],和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求才若渴之心相比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事实证明,这套技法虽不新鲜却是屡试不爽,比如后来袁世凯又全套奉送给了汪精卫。书生气过重的人容易轻信,头脑简单又满腔热情,身处官场,行事为人方面就有诸多不足之处,也容易遭人算计,比如唐绍仪曾暗中使坏弄没了杨度的教育总长职位,帝制复辟失败全国声讨之时也无一人肯为杨度说情。还是杨度的妹妹才女叔姬看得明白:“当政秉国另有一套办法,与做出来的文章大不一样;若一味按文章中的正理去做,绝对挤不进当政秉国者行列之中,即使侥幸进了,也做不成大事。”^{[2][298]}

而说杨度输在了帝王之术上,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与当时瞬息万变、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有关。作者唐浩明称帝王之学为“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帝王之学不能行时的关键之所在,是因为时代不同了”,“与天作对,与时作对,这就是他们身怀绝学而不能大获市利的根本原因”^[5]。如果不是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或许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杨度能在这政治权术的大熔炉中被锻造出来,拥有实力,实现宏愿。然而时间不允许了。连静竹、小凤仙这样的下层女子都不愿意再见帝制,足以见得其大势已去,民主才是人心所向。还在帝王之学营造的光辉前景中沉醉不醒,企图挂着“君宪”羊头卖“帝制”狗肉的杨度,只能“可笑地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滑稽丑角”^[5]。而随着帝制复辟的彻底夭折,杨度的政客生涯也随之走到了终点。

三 禅师杨度

著名国学大师南怀瑾曾把唐宋以后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比作三个大店,“佛家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道家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6]过去杨度做书生做政客天天吃孔孟思想的粮店,由于和佛家渊源深厚,也爱时常去佛家的百货店逛逛。现在的杨度政治上受挫生了大病,按理应该自动找到道家的药店去,像他的老师王闿运一样寻到治病养身的良方,无奈他没有机会及时补上恩师的老庄之学,所以对“药店”的感情始终没有“百货店”深,终于在“药店”转了两圈后一头扎进了逛熟了的“百货店”,还给自己取了个“虎陀禅师”的法名。

按理,进“药店”还是“百货店”对杨度来说应该关系不大,因为他患的主要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心药也不一定都放在药店里。再说,“佛教东来,……起先用庄老会通佛教,其次用孔孟会通佛教……”“魏、晋、南北朝佛学上之大贡献,不仅在能把印度佛教尽量吸收。更重要的,在能加以彻底消化,接上中国传统文化,使逐渐转为我所有,使在老根上发新葩。”^[7]禅宗不过是儒道思想的进一步推进,“百货店”也可以起到“药店”的功能。但是,不知是“百货店”的治病手段终究不能与“药店”同日而语,还是他实在是“病”得太重,禅师杨度到最后还是没能放下“虐了他千万遍”的政治。可见儒家的粮店的确得天天吃,即使是在生了病的时候。

当八指头陀的诗集将杨度引进佛学王国之后,

他马上“立志要很快弄清各宗各派的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一门超越任何宗派高出历代佛祖的新佛学来”^{[2]276},以解除世人烦恼;当杨度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庐山月夜领悟了佛门的最高境趣之后,“如同二十年前刚步入政界,便立志要做王佐之才一样,刚跨入佛学殿堂的杨度,便决心横扫历代佛祖,做中土佛学界第一人”^{[2]286},抱负跟霸气都丝毫不减当年,很难说不是心底的政治抱负在“借佛学之尸还魂”。而在离开庐山之际所作的诗句“穷通治乱无关系”“帝师王佐都抛却”中,杨度的心思更是显而易见:内心深处始终抛不下“穷通治乱”“帝师王佐”。还是书画大师齐白石看得透彻,“他明白像杨哲子这样一类人的心思:得意时则拼命做官,不计后果;失意时逃庄逃佛,表示已经看破红尘,与世无争。其实是自欺欺人,内心里一定痛苦得不得了,逍遥也好,不争也好,都是装出来的。”^{[2]318}果不其然,一个偶然的机会,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几句俗家言一语惊醒梦中人,杨度猛然想到“政治和参佛也应该可以并行不悖,并借助参佛来促进从政”^{[2]323}。于是在陈炯明叛变的危急关头,杨度践行了当年与孙中山“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我将助先生”的诺言,关键时刻帮了孙中山一把,同时也算与政治冰释前嫌。

禅诗有云:开悟之前砍柴挑水,开悟之后砍柴挑水。政治还是曾经的政治,杨度已不是曾经的杨度了。昔日的杨度,曾因过于强烈的事功心蒙蔽了他的政治信仰和爱国情怀,如今,事功之心淡漠了,政治信仰破灭了,但杨度仍有一份爱国情怀放不下。刘揆一说:“如何来衡量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节操?我以为首先看的是他心中有无为国为民的大目标。有则好,无则不好。”所以,“杨度是个有大节的政治活动家”^{[2]328}。当得知孙中山在南方政府中给自己留了一个重要职位时,“他的热血又开始沸腾,激情又重新洋溢。杨度这时才清醒地认识到,万象皆空的佛门学说,不管他怎样苦苦修炼虔诚奉行,始终没有在身上扎下根基,而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思想,却早已深深地融进了他的骨肉血液中,割舍不去,与生俱存!”^{[2]367}尽管随着孙中山的辞世杨度的希望再度落空,但在一颗爱国之心的灼烧下,佛学世界也注定不是杨度最终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在书生、政客、禅师三副面孔之后最终却“无枝可依”的杨度,留给人生的无疑只剩一副悲剧的面孔。

四 悲剧杨度

做书生而不甘,做政客而不得,做禅师又不能,

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的杨度只能以“悲剧”二字作为人生最后的注脚。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路口,作为中国“最末一代士大夫”与“20世纪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8]82},他的悲剧人生既是中国无数传统读书人生存状态的缩影,也给后世知识分子以无尽的启示。

作为中国“最末一代士大夫”,杨度的仕途沉浮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读书人实现人生价值与政治理想的“三难”。

第一难,狭窄的实现人生价值之路——出仕。孔孟思想的耳濡目染,无比森严的等级制度,再加上众多先辈的成功经验,出仕基本成了中国传统读书人改变人生唯一的同时也是最好的选择。具体途径有二,其一是唐代以后的路子——科举,其二在战国时代最为辉煌鼎盛,即杨度及其师王闾运“辅非常之人,握非常之机,谋非常之策,建非常之功”的“帝王之术”。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总是铺满荆棘,无疑这两条路都不太好走。科举自不用言,抛开“寒窗苦读”那些艰辛,像唐伯虎、杨度这样有着惊世才学的还得看天命运数,更不要提那些平庸之辈。至于第二条就更难了,“世道,机遇,命数”统统都得算上,杨度也是科举之路行不通才转而选择了这条路,若无中西贯通的才学和帝王之术的功底,也难保不落得一个被埋没的下场。如此一番严格筛选,今日的高考独木桥较当年出仕之路已经算是很宽很宽了。

第二难,书生意气、“内圣外王”与黑暗权术的冲突。“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对政治权术的必然需求,并为政治权术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天然适宜的‘土壤’。”^{[5]7}所谓“无权术,不官场”,刚千辛万苦迈进了门,读书人多有的书生意气和儒家“内圣外王”理念就遇到了大敌甚至克星。杨度本人的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书生意气的不良后果,其师王闾运对这个得意门生也曾做过“书痴”的评价。而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即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事功伟业,则从根本上决定即便这些读书人精通了各类权术,也不可能像官场上那些只求功名利禄之徒一样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地滥用,而是要讲节制讲节操,正所谓心甘情愿地“戴着镣铐跳舞”。能做到曾国藩那种境界的毕竟少之又少,到头来能求得全身而退就已实属不易了。

第三难,政治抱负与依附现实的矛盾。前两关过起来虽然已是难上加难,但把官做稳并不能让这些有志之士感到满足,在他们心里,实现神圣的政

治抱负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然而,时迁世易,战国策士的风采早已不见,刘备的三顾茅庐也早已成为美好的神话,空有一腔热情和满肚子学问的仁人志士们除了盛世依附皇帝,乱世投靠诸侯,其实什么也做不了。杨度先后投靠袁世凯和袁克定二人,本是希望借助他们来践行帝王之学,其实是把位置弄反了,自己说到底不过是人家手里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罢了。袁氏父子所看重的不过是杨度能作鼓吹文章的御用文人身份,从这个角度看来,“旷世逸才”的美称简直就是个绝佳的讽刺!而在唐浩明另一部作品《张之洞》中,历经宦海几十年的张之洞临终之际留下的感慨却是“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9],可见政治抱负实现起来究竟有多难。

出仕难,为官难,实现政治抱负更难。几千年来,能连过三关的读书人可谓凤毛麟角。而杨度,不过是以他的悲剧人生为这一真理又一次提供了佐证罢了。

旧时代的悲剧已经谢幕,新时代的剧情也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上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提到过“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10],风云际会、新旧交替的清末民初,包括杨度在内的“20世纪第一代知识分子”,正站在了这一“边缘化”的起点上。他们一面享受着传统士大夫阶层最后的落日余晖,一面也预示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人生走向:战国士大夫纵横捭阖的豪气风姿最终只能沦为史册上的一段传奇,西风浸染,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注定要从政治的中心游离,去寻求新的人生位置。

笔者一直认为,过分用小说的手法书写历史,有亵渎历史的嫌疑;而完全用历史的眼光评判小说,则是对小说的不公。历史与小说,二者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但又毕竟性情各异。而身为一位历史小说创作者,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情,唐浩明先生在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方面可谓树立了一个典范。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曾说,“扎实刻苦地研究史料,把握住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基本历史形象,是文学形象塑造的基础所在”;“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努力做到与之心灵相通,是历史小说中文学形象塑造的成功关键”;而“衡情推理,弥补史料之不足,可使艺术真实超越信史”^{[1]42-43}。正是遵循着这样的创作原则,唐浩明以一位学者的严谨和一个作家的感性尝试重现了杨度人生选择的心路历程,使得早已被历史定论“风干”的杨度形象在他独具个人特色的笔下重又

鲜活饱满起来,其丰富性深刻性不仅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了历史上的杨度个人,更是展现了大变革时代的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其中,人生的追寻与迷惘,人性的美好与复杂,甚至也映现出了我们自己的影子。总之,作者以其坚定的人文立场,深厚的史学修养以及独特的艺术气质塑造出了一个呈现出书生、政客、禅师、悲剧四副面孔的杨度形象,其深厚的历史意蕴和无限的艺术张力不仅超越了历史定论,即便是在同题材的历史小说作品中也堪称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而身为读者,面对小说,又何必过于斤斤计较历史上的杨度形象到底如何,小说毕竟是小说,历史提供了材料,作家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将它们烹成美味佳肴,“它原来是什么”固然重要,而“我们读到了什么”才真正重要的。

李鸿章曾言晚清乃“三千年一大变局也”。唐浩明历史小说系列所呈现的,正是这大变局、大时代一批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心路历程。“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8]史学专家许纪霖的这段话,正可为他们不凡却又悲情的人生做一个恰当的注脚。

参考文献:

- [1] 唐浩明. 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J]. 文学评论, 1995(6): 42-43.
- [2] 唐浩明. 杨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3] 唐浩明. 我笔下的湘潭历史人物——在湘潭市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专题演讲[DB/OL]. (2007-11-21)[2015-11-19]. <http://www.jianwendi.com/list.asp?ID=358>.
- [4] 余华青. 权术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68.
- [5] 浩明. 帝王之学: 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历史小说创作随感[J]. 理论与创作, 1999(2): 10-12.
- [6] 南怀瑾. 论语别裁[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1.
- [7] 钱穆. 国史新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54-155.
- [8] 许纪霖.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 [9] 唐浩明. 张之洞[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592.
- [10] 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J]. 二十一世纪, 1991(6): 81.

责任编辑: 黄声波